

引言：走进“新课程”

□一个名叫“富窝”的山村小学

2003年4月17日，星期四，中午11时，我坐了4个小时的大巴，到达粤西一个小城镇。5年前，广州师范学院（2000年和另外几所学校合并为“广州大学”）中文系在这里办了一个“本科函授班”，我当时给学员讲授“语文教学论”。

纪念中学的徐老师在车站接我。徐老师是当年的学员。一个月前，我对他说，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经进入实验阶段，我作为语文教育教研室教师，有责任了解“课改”的背景与现状。我特别对徐老师说：“希望到偏远一点的学校听听课。”

下午2时，徐老师用摩托车载我到富窝小学。这所小学离城镇有六七公里。

沿途一片田园风光，空气清新，使我暂时离开了对“非典型肺炎”的恐惧。

上学时分，不时见到一群群孩子，他们穿着各色衣服。我们沿着这条“线索”，爬上一个低矮的斜坡，就到了“富窝”。进入大门，看见一块小小的木板被什么东西支撑在地面上，上面贴着一张红纸，用毛笔写着“欢迎指导”几个大字。

我在五年级听课。说是“级”，其实就一个班。“富窝”一共6个年级，238人。

五年级有37人，12个男孩。

课堂正中贴着“勤学、友爱、求实、奋进”8个大字。后面墙壁上是“学习园地”。墙角放着几把用树枝捆扎成的扫帚。26年

前，我在粤北韶关一所学校的农场分校当“校长”时经常使用这种扫帚。

“你见过赛马吗？想了解这种活动吗？”老师向学生提问。这是一位女教师，20多岁，戴一副近视眼镜，略显文静。她毕业于粤西一所大学的函授大专。这节课讲的是《田忌赛马》。

教师出示生字卡，让学生个别读和齐读。学生积极性很高，读得很起劲，有几个边读边不时偷看我一眼。

“同学们注意啦，‘忌’字上面是开口的……大家想一想，田忌跟谁赛马？赛马有什么规则？赛马的结果怎样？”话音未落，“呼”的一下，37只手一齐举起。

课后，女教师红着脸小声对我说：“教授，我讲得不好。”

在“充分肯定”的基础上，我说：“在另外一所学校，我也听过一位老师讲这篇课文，有的环节她的处理方法跟你有所不同。比如，学生回答问题之前，老师先要求他们‘认真想一想，议一议，再回答’。这样，效果应该会好一些，有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另外，这位老师还尽量创造条件让学生自己去发现值得‘注意’的问题。”

女教师轻轻摇了摇头：“我们的学生提不出什么问题。”

校长陪我到办公室。校长也很年轻，教两个年级的英语。他说：“明年三年级也要开英语。但由于师资不够，现在的三年级要过两年，也就是到了五年级才能学英语。至于信息教育课，没法开了，硬件不够。学校只有一台计算机，办公用的。”

办公室只有一间。好几张桌子拼在一起，分成两组。

校长拉出一张年久失修的长椅子，往上面铺上一张塑料布，再垫上一张报纸，招呼我和徐老师坐下。

全校一共10位教师，校长向我一一介绍后说：“我们都很高兴，从来没有一位教授级别的人来过我们这样的一所小学校。现在教学真是很困难，主要是学生不想学。我一直都在想，也想不出什么好法子。这里穷，但我们学校一带还算稍为富一点。不少农民种砂糖橘发了，一年几万，有的十几万。”

我想起刚才来学校时经过的一段路，靠水田的另一边有不少新

建起的小洋楼。

校长显得有点无奈：“珠江三角洲的人，有了钱就让孩子读书。我们这里不是的，觉得读了书没有用，辛辛苦苦读个中专、大专，还不如种砂糖橘。有了钱也不想花在读书上，觉得钱是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很多学生晚上出去耍，去看电视。”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这里牵涉到社会问题，也牵涉到教育问题。如何赚钱，如何富起来，这是很现实的。农民没有‘铁饭碗’，就那么一点钱，用在什么地方，他们都要认真想一想。当然，我们也可以试试让他们换个角度考虑问题。如果通过读书，能使孩子聪明起来，视野开阔一点，发展的机会不是更大吗？如果学生认识到这一点，会不会乐意来学呢？他们的家长，会不会支持他们来学呢？皮球踢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得使课堂成为一个快乐的园地，成为一个使学生开心的地方。我们得把课上得好一点，让学生能真正学到东西。比如语文，整天让他们背‘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多枯燥呀！都是老师讲，学生听，他们当然认为这样不可能聪明起来，不可能使视野开阔。”

外面响起放学的铃声，孩子们三三两两地经过窗前。

校长诚恳地问：“我们该怎么办？”

“按部署，‘富窝’最迟明年秋天也要进入‘新课程’了。你们组织学习过‘课程标准’没有？”

校长想了想，拉开办公桌的抽屉，取出一本崭新而干净的蓝色封面的小册子。

我说：“这是‘语文’，还有‘数学’、‘英语’，每科一本。将来上面会组织培训。培训前老师们最好也先做点‘预习’。不要看只有薄薄几十页，但在教学方面、考试方面，理念层面、操作层面，都会给我们一些启示。”

这时离《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正式出版已经将近两年了。“课程改革”已进入实验阶段，深圳市南山区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正在使用实验教材。

“我们能为‘富窝’做些什么？”在回城镇的路上，我问徐老师。

“我们能做什么？这样的小学算好的啦。有空，我带你到更偏远的地方去看看。”

“不能只‘看看’吧。农村教育资金缺乏，大家都在呼吁。但在‘呼吁’的同时，我们作为普通一员，是不是该做些什么？比如提供一点技术支持，提供一些书。”

“……你想给他们什么书？”

我能给他们什么“书”？他们需要什么“书”？

2002年4月，我带学生到广州市越秀区海珠北小学实习。实习期间，我在小学的教务处看到，主任们刚刚从区教育局带回来好几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 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 解读》。这本书已经是第9版了，很厚，有436页，但附录的“纲要”仅12页，其他都是“解读”。

这几年，我无论是讲课还是做讲座，都要对这本带有“纲领性”的书进行“助销”。

“知道这本书吗？”

总是有几个人会举起手来的。有的“恍然大悟”的样子：“啊是那本‘绿皮书’吧。”

“看过吗？”

“翻过一下。”

至少“纲要”应该看过吧。这是教育部2001年颁发的文件。我们现在经常提的“三维目标”（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就是“纲要”中提出的这轮课程改革6个“理想”目标中的第一个。各个学科的“课标”是以“纲要”为依据编制的。

2004年7月29日，我对某大城市一个“专升本”教学班的43位学员（都是在职中小学教师）做了个小统计，“完全不知道”“纲要”的有27人，占63%，另外37%的人回答“粗略了解”。但当我问他们有没有看过“原件”时，竟然没有一个“敢”把手举起来。他们对课程改革的了解基本上都是“听”回来的。

“没有看过”或“只翻过一下”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我

们应该强调读“原著”，身在“第一线”的教师必须了解最基本的东西，了解改革的基本精神。作为社会上有“文化”的人，他们应该有这方面的能力。另一方面，我们的专家、学者在生产“科研成果”的时候也应多注意成果“应用者”的情况，多注意我们这支教师队伍的实际情况。我有时想，如果我们在出版一些高档次的学术著作的同时，适当地编写一些像洪昭光《我的健康忠告》之类的小册子，供“富窝”们品尝，可能我们的“理想”更容易被他们理解，也将更容易变成现实。

“富窝”小学是“新课程”改革的复杂背景中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我们将依靠那位年轻校长和其他 9 位教师把“富窝”的学生带进“新课程”，实现我们的理想。

□ 《女儿的作业》

我一想起前几年开展的语文教学社会性大讨论，就有一种耻辱感。我总以某报社一篇文章的标题“误尽苍生是语文”来鞭策我的学生，他们都是准语文教师。“大讨论”的引火点是《北京文学》1997 年第 11 期“世纪观察”栏目的 3 篇文章：一位作家身份的小学生家长写的《女儿的作业》，一位离职不久的中学教师写的《中学语文教学手记》，一位大学中文系教师写的《文学教育的悲哀》。这 3 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中小学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其中，《诗刊》杂志社一位编辑在《女儿的作业》这篇文章中谈了这么一件事：女儿的一次语文作业是“要求根据句子意思写成语”，其中一个“句子意思”是“思想一致，共同努力”，女儿回答“齐心协力”，老师认为“错”，“应该是‘同心协力’”；另一个“句子意思”是“刻画描摹得非常逼真”，女儿回答“栩栩如生”，老师又认为“错”，“应该是‘惟妙惟肖’”。作者很感慨地说：“中国语言之丰富，词汇之多，所谓同义词、近义词，相应的不止一条，怎么会只有一个答案呢？”作者认为：“那位教师的这样的做法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孩子对问题的独立思考，让本应积极思考、大胆回答问题的孩子变得谨小慎微，这与当今提倡不断

创新、勇于开拓的时代精神是不相符合的。”

近几年来，教育界很强调创新教育。这“创新教育”是什么意思？按照《现代汉语词典》说法，创新就是“抛开旧的，创造新的”，指“创造性、新意”。创新教育，就是要使学生有一种“创造新的”精神，学习上要有创造性。这里首先强调的应该是一种意识。实际上，一个班几十个学生，一个学校成百上千个学生，一个城市几万、几十万个学生，都来“创造新的”，并不现实。它强调的是一种意识，即从小培养一种意识，一种创新意识。一个人如果没有创新意识，就不可能取得成就；一个民族没有创新意识，就没有希望。

前几年，教育领域有一个流行词语——“减负”。大家都为学生沉重的书包忧虑。只要到毕业班的课室看看，你就会被那里的“景观”折服，学生都差点被“书海”淹没了。2004年3月，一位在广州大学作讲座的专家还介绍了他在某地讲学时的所见：“有一个书包竟然还带着轮子。”但实际上，这个“负”还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对这个“负”只是理解为“量”。而现在已注意到“质”的问题了：学了不少没有用或用处不大的东西，而该学的东西，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如创新的意志和品质，没有学到（或者说“养成”）。

语文教学经常要求学生给课文“分段”、“归纳段意”，实际上，这个“分段”往往不是只有一种“说法”。学生答得有道理，老师就没有必要公布“标准答案”了。但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是让学生机械地去记录、背诵“老师的看法”。试想，把几十岁人的思考强加给十多岁的学生，要求他们完全按“老一辈”的经验去理解课文，怎么理解得了？

如果学生那种主动性、自觉性、创新性从小得不到培养，反而被扼杀，那么，到了大学，“恶果”就会表现出来。试想想，当现代文学教授布置“分析鲁迅作品”这样一篇作业时，大学生们首先会想到什么？他们头脑中的“资料库”塞满的是《祝福》、《阿Q正传》、《故乡》的“标准答案”。

我多次向我的学生推荐袁振国先生的《教育新理念》（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这本书通过大量案例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属于通俗易懂的“示范性读物”。其中有一个案例是这样的：

一位教师在幼儿园的黑板上画了一个圆，问：“小朋友们，你们想象一下，这个圆可能是什么？”结果在两分钟内，小朋友们说出了 22 个不同的答案。有的说，这是一个苹果；有的说，这是一个月亮；有的说，这是一个烧饼；有一个小朋友说，这是老师的大眼睛。这位教师拿同样的问题到大学一年级去问。也要学生们想象一下黑板上的圆可能是什么。结果两分钟过去了，没有一个同学发言。教师没有办法，只好点名请班长带头发言。班长慢吞吞地站起来迟疑地说：“这——大概是个零吧？”大学生们真的全部失去想象力了吗？不是的，经过多年教育，他们已建立了一个信念：老师的任何问题都是有一个“标准答案”的……

我上课说到这个“故事”时，学生都认同地笑起来。在实际的学习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的中学生、小学生，他们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创新性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我们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教师们并不是不知道，他们也并不是不想去改变这种状况，但仅仅靠他们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北京文学》那 3 篇文章的意义在于促使全社会都关注教育的“问题”，尽管接下来“大讨论”中报刊文章上不少言词过于偏激，使一线教师感到相当的难受和委屈。

□第 8 次课程改革启动

回顾历史是为了发现规律。

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政治上看，这是改革开放的标志。在教育方面，1978 年有以下几件大事：

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颁布了《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草案规定：坚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保证政治课和文化课的教学时间，按照教学大纲和教材要求，完成教学计划，提高教学质量。

我国恢复向国外选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

1978年春，“77级”学生入学，这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1978年秋，“78级”学生入学。

这个“序幕”很理想，整个教育事业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1978—1999年，我们经历了建国后的第5次课程改革（1978年；拨乱反正），第6次课程改革（1981年，调整教学计划），第7次课程改革（1986年，《义务教育法》；1996年，普通高中教学改革）。当然，这几次改革被称为“课程改革”是现在给“正”的“名”。

1999年，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了改革现行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研制和构建了面向新世纪的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体系的任务，新一轮，即第8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开始启动。

前面提到的《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 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一书中有一段话比较能说明国家推行这次改革的初衷：“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之所以被如此重要而紧迫地提出来，首先是由于它是整个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课程集中体现了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课程是实施培养目标的施工蓝图；课程是组织教育教学活动的最主要的依据。综观中外教育改革，无不把课程改革放在突出位置，把课程作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来加以改革和建设。其次，在当前突出地强调课程改革，又是因为我国现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体系不适应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要求，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建国以来，我国先后进行了七次课程改革，每次改革都取得了明显成就……但是，课程是必须不断改革、不断建设、不断创新的。”

“首先”是从“课程”的本质及国际发展新趋势角度论述的。在各种类型的“新课程培训学习班”中，专家们都对此展开阐述：要力求课程基础性、多样化和选择性的统一，使学术性课程与学生经验及职业发展有机结合。具体来说，就是要适应时代要求增设新的课程，赋予学校更多的课程自主权，倡导学生自定学习计划。

“其次”是从我国国情角度论述的。实际上，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可以举出大量类似于“画圆”的案例。

还可以从正面来理解课程改革的“背景”：中国必须提高人口素质，由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为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奠定基础。

2001年秋季，全国确立了38个“国家级”课程改革实验区，实验区中的小学一年级学生和初中一年级学生开始“走进新课程”。深圳市南山区即是其中之一。

‘走进新课程’意味着什么？”我经常这样和教师们展开对话。

“使用实验教材。”几乎是异口同声。

“实验教材”是一个主要“标志”，但这只是课程改革的其中一项内容，除此之外，还有课程功能转变、校本课程建设、学习方式及评价方式变革，等等。

2002年秋季，扩大实验范围，原则上每个地级市可确定一个“省级”课程改革实验区。广州市东山区是其中之一。广东省全省共30个实验区进入“新课程”。

期间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一年10月，我到广州市某区一所民办学校听我们的实习生上课，那里的课室门口的小牌牌分别写着“七年（1）班”、“七年（2）班”。我当时有点困惑：这里也“走进新课程”了吗？我向实习生了解：“这里用的是什么教材？”

“新教材。”

我把教材拿来一看，不是“实验版”，只是“过渡版”。由于这几年教材变化比较大，经常换面孔，也就年年“新”了。

还没有开始“实验”，为什么要改为“七年”几班呢？我想，这所民办学校的改革意识还是比较强的，他们在这方面很敏感，希望早日“走进新课程”，但改革绝不仅仅是换一个“牌牌”，要有实质性的东西，要按照“纲要”和“课标”去开展一些实验。

2003年秋季，全国实验“新课程”的学生达到35%左右。广州市属各区都进入“新课程”。广东全省则再增加44个“新课程”实验区。记得在这之前有一篇文章提出这一年广东全省义务教育阶

段各起始年级都将实施“新课程”，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到。教育厅一位处长对我说：“主要困难是对教师培训的压力太大。”我想，对于“上面”来说可能主要是经济上和组织上的压力，而实际上更难以把握的是“培训”的效果。这种效果和培训者水平有关，也和被培训者的态度有关。2002年，我们承担第一次“培训”任务，报到那天，来自珠三角某城市某中学的几位年轻教师当了解到最后一天也被安排“上课”时，不满地说：“按惯例，最后一天应该自由活动。”其实，这一期“培训”一共也就4天。

2004年秋季，广东省113个区的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和初中起始年级都进入“新课程”。这年暑假，我在富窝小学所在的粤西小城镇见到了进修学校的K主任，他也承担了那批乘坐“末班车”的小学教师的培训任务，要讲一天课。我问：“你到外面参加过‘新课程’的学习没有？”K主任流露出一丝遗憾：“没有。我们这里只有一个名额。接受培训的那位老师回来给我们‘传达’了两个小时，然后我就找了一些资料来看。”我笑起来：“你也是自学成才。”

这一年，广东1032所高中的起始年级也和海南、山东、宁夏“携手”“一次性”同步开展课程改革实验。

到2005年秋季，全国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各起始年级原则上都将进入新课程体系。

我们看到了比较严密、比较科学的程序，这次看来是下定决心了，但困难从一开始就已存在，2002年秋，属地级市的粤北某市并没有“省级实验区”。

□教师的责任

2003年10月在上海建平中学举办的“语文教学研讨会”可以看作是“新课程”实验的中期总结。这是一次难得的、健康的研讨活动（基本上没有看到那些旅游式的“拉家带口”的场景）。大会安排颇具创意：半天为一段，每段包括1个小时的主题发言，1节“新秀实验课”，以及1个多小时的专家点评。每位专家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课程改革的“必要性”。

一位“课程组”专家介绍改革背景时说，一个世纪以来，课程改革进行了两次重大转型。一次是 20 世纪初，标志是语文学科开始形成。分科教学，是吸收了西方思想。第二次是本次，课程结构发生了变化，学习内容和目标也发生了变化。后工业时代对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目标多元了。能力不是唯一目标，要关注学生多方面的发展。

现在的“报告会”提倡“互动”，报告者预留若干时间给听众提问。这位课程专家在回答“这次改革和以前有什么不同”这张“纸条”时说：“这次是在课程这个层面上改革。过去教师、学校领导不用关心课程，只管教学，课程由国家管理。现在‘权力’重新分配，地方、学校以后要投入力量开发课程。教师要关注课程改革，参与课程建设。课程层面包括目标、内容、教学方式、学习方式和管理。”他强调：“现在形势很严峻。原来落后的国家想抓机遇，先进的不想落后。劳动力多，在农业社会是优势，但现在要求创新人才 大量的文盲就是包袱。”

在回答“创新人才的培养更应是大学的任务，为什么要放到中学来呢？”这个问题时，这位专家说：“如果小学没有创新意识，到大学就完了，开发不出来，来不及了。创新有不同层次，就是和人家不一样。最主要要有创新氛围。有一所大学，一个女孩子剃光头，别人议论纷纷，她只得戴上帽子。对这种情况我们要宽容。她不过是要跟其他女孩不一样，跟自己以前不一样，没违反法律。这个创新氛围对创新人才的培养不利。”

华东地区某大学一位文艺理论教授举了一个颇发人深思的“德育”例子：某大城市有一个青年作家，散文写得很好，在中学就是语文尖子，这几年出了好几本书。有一次，他和一个朋友聚会，在谈到小煤窑出现的灾难时，朋友显得很气愤。“作家”说：“你为什么这么激动？”朋友反问：“难道你就没有反应吗？”作家说：“他们跟我没有有什么关系！”

另外一位参与制订“课程改革方案”的专家发言时说：“没有观念，就没有生命。一个民族到了不会表现观念时就没有生命了。如果没有自己的东西，就没有人关注你了。”他讲了一个颇引人注

意的“故事”：西方某国家一位教师组织学生讨论，要他们就“其他国家粮食短缺谈谈自己的看法”。结果，美国的学生不知道什么叫“其他国家”，欧洲的学生不知道什么叫“短缺”，非洲的学生不知道什么叫“粮食”，中国的学生不知道什么叫“自己的看法”。我更相信这只是个“笑话”，但它却能反映出一定的现实，以及人们对中国教育的看法。

一位受人尊敬的特级教师说：“我们发展快，人家也没有睡大觉。我们国家的教育形势相当严峻。改革势在必行。今天的教育是明日的科技，后日的经济。有出类拔萃的人就有高科技。综合国力的竞争就是人才之争，人的素质之争。没有现代化的人，引进的先进机器只是一堆废铁。这次改革不是小打小闹，是提高全民素质，重塑民族精神，是战略的需要。基础教育是影响人的终身的，启发自己终身的是中小学，尤其是中学，这关系到千家万户。”关于教师的责任，这位特级教师说：“给教育界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对教师的挑战。教师是理论向实践的转换者。每位教师自觉不自觉、愿意不愿意都要回答：面对新‘课标’，我该怎么办？”

建平中学的这次会议，还显现了这轮课程改革的-一个特点：不少高校教师直接参与课程改革，他们在制定“改革纲要”和“课标”、编写教材、组织教师培训等方面表现出自己的智慧，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方智范先生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也是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制定者之一。2003年10月，他在广州市珠江宾馆给广东省高中语文教研员作了一个讲座。他谈了制定课程标准的指导思想：必须突出学生的发展，一切为了学生；课程内容上要强调学生经验、学科知识和社会发展三方面整合；课程不仅要有明确的结果性目标，也要提出一系列过程性目标，体验性目标；语文学科的知识是隐性的、实践的，要使学生在获得知识的同时学会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价值观。方先生说：“要把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作为重点。这是我们民族不怎么占有优势的方面。要把教学过程看作师生之间的互动过程。要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满足不同的需要。高中阶段要突出选择性和多样性，要创造让学生主动参与的学

习环境。高中阶段是学生成为社会人的转折点，他们的身心发展渐趋成熟，培养目标应该定位为‘既有中国灵魂又有世界眼光的现代公民’。”

听着这一番话，你很难把方先生和“古代文学教授”联系起来。2004年7月13日，当方先生应我们的邀请到广州大学给“高中语文课程培训班”学员讲课时，我利用空隙时间问了他一个比较“隐私”的问题：“方先生，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你怎么从一个古代文学教授成为一个‘课程专家’的。说得直白一点，教育部是怎么选上你的？”

方先生笑了笑：“是有条件的，比如要有基础教育的经验。我们华东师大一共选派了3个人。我在中学教过6年书，还是教研组长呢。倪文锦更不用说了，他是研究教材教法的。巢宗祺也教过两年语文。”

“改革纲要”鼓励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投身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我想听听方先生的看法：“你觉得高校教师的优势在哪里呢？”

“学科背景很重要。我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对文艺理论也颇有兴趣，当遇到有关教学方面的问题，语文教学中的具体问题，我会运用有关理论知识去解决。我感到自己的综合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另外，课程组里每个人的学科背景不一样，可以在自己学科方面发挥作用。如巢老师就是教语言的。”

“我听了你两次讲座，也看了你发表的论文，在‘教学论’的不少方面你已经超过一些‘行家’。”

“我找了好几本教材教法的书来看，对这方面有了一个了解，也看了一些教育学的书，了解了建构主义。当然，我这方面的理论还不足，要经常到中小学听课，不懂就请教别人。”

在现实中，不可否认，中学教师和大学教师之间有时是会产生小小“疙瘩”的，这种“疙瘩”尽管不明显，但绝对不利于当前的课程改革。作为大学教师，当他们在“课程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时，的确要注意到自己薄弱的一面。某著名语文刊物2002年第10期的一篇文章《话说中学教师与大学教授》尽管某些言辞颇

不“中听”，但有些批评的确也起到“鞭策”和“警醒”的作用：“教授们的长处似乎很明确，理论视野开阔，他们总忙于建立学科体系，出一本本砖头大小的著作，是他们努力的目标，因此他们多数人无暇也不屑于到中学去实际研究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这里说的“多数人”我不赞同，但确实有个深入“实际”的问题。G大学教师小E对我说，他们那里有这样一位“教学法教授”，教了十多年中学“教学法”，出了好几部中学“教学法”专著，却几乎从来不到中学听听一线教师的课，更不用说主动带自己的学生到一线去了。小E生气地说：“这不就是‘闭门造车’吗！”这样的“教授”当然是不及格的，当然不会受到中学教师的欢迎。

大学教师要在这轮课程改革中发挥作用，他们自身首先得具备高度的责任感。我很赞成华南师大人文学院一位负责人2004年7月15日在广州大学“高中语文课程培训班”上讲的一番话：“为什么那么多教授把大量精力放在基础教育研究上？像钱理群、董庆炳，也参与了教材的编写。为什么大家非常关心这些事？我们民族的素质需要提高，要提高就要从青少年抓起。我也是搞文艺学的，搞文艺学的人往往对很多问题有所思考，如价值观、人生观、人文性的东西。大家感到责任重大。”

我们看到了专家们发自肺腑的心声。在建平中学的礼堂里，我感受到了上海的力量。一个群体，一股中坚力量，凝聚在一起。我当时想起了广东，广东并不是没有人才，而是需要有一股更强大的把人才团结在一起的力量，把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把中小学教师和大学教师团结在一起的力量，现在，这股力量也正在形成。

中小学实施“新课程”改革后，我所在的广州大学中文系的不少教师，非常想了解有关情况，希望和中小学“接轨”。我们的学生95%都是师范生。于是，2003年4月29日，我们请广东省教育厅教研室吴惟粤主任作了题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语文教学”的讲座。讲座对象原本是全体中文系教师，由于“非典”，范围缩小到教研室主任，但还是有不少热心的教师“冒着生命危险”来参加。

吴主任对我们这次活动给予了肯定。他说：“高校师范教育和

基础教育密不可分的。华南师大一位副校长说，对这次改革有了一定了解后，首先反应到的就是华师的专业设置要调整。他们各个学院、系主任也感到，院系的教学内容要调整。基础教育和国际接轨 反过来对高校也有新要求。”

我请吴主任谈谈“对一年多课程实验进展的看法”。

吴主任说：“现在大家都知道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了。师生关系得到了改善。老师尊重学生的人格，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考虑到学生的发展倾向，学习方式开始发生变化。另外，评价已引起重视 并开始探索。”

“在这轮改革中 广东有些什么想法？”

“广东希望成为基础教育实验基地，希望成为评价基地，希望成为基础教育课程资源研究开发基地，在网络、教材、资料方面进行开发。我省是高考改革先锋，从 1985 年开始，积极努力探索，希望成为高考实验研究示范基地。最终探索如何使广东成为学习型社会 成为人力资源强省。”

的确，第 8 次课程改革应是一次“机遇”。广东在培训教师方面“下足本钱”，“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就拿 2004 年 7 月中旬，我们承担的“广州市高中语文课程培训班”来说，近 600 人，办了 5 天，生活安排不能说不周到，学习内容不能说不充实，费用投入不能说不大，请一位外省专家讲半天课，“成本”数千元。

国家虽然决心很大，但这样的培训工作毕竟也属于“摸着石头过河”。能不能做得更好一些呢？比如，我们有时会看到这样一种颇为尴尬的局面：讲课过程中，计算机出了故障，缺乏文字方面的视觉感应，相当一部分学员立刻不知专家所云。是学员们“素质”太差，无法“调教”呢，还是专家们的讲课缺乏“深入浅出”？一些名词术语缺乏“本土化”？

培训时，学员们盯得最紧的是一本一本厚厚的辅导书，以及专家们的发言稿，这体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但他们又总是发出感叹：这些读物大多似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们的课程强调“国家”、“地区”和“校本”三个等级，我们的培训教材的

编写也应该体现出这方面的精神。

课程改革最终是否取得成功，教师是关键。一线教师的态度如何？下面两场不同主体的讨论应该颇有代表性。

广州大学中文系成人教育本科班的学员基本上都是中小学一线教师。2003年2月22日，我组织他们进行了一场讨论：对这次“课程改革”有信心吗？

陈老师在广州市白云区同和镇京溪小学任教，她说：“我充满信心。我教了10年小学高年级语文，感觉小学语文这两年好教了。新选课文有时代感，有人性真情的美，死记硬背的内容少了。课堂中可以与学生美美地陶醉在优秀文章中。”

吴老师在广州市海珠区卫国尧纪念小学教数学，她表示：“我教了4年数学，很有信心。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当然避免不了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只要坚持正确的努力方向，就可以使课程改革走上顺利的轨道。这学期我在实践中引导学生一起感受‘人人学有用的数学，人人学有价值的数学，人人学需要的数学’，效果比较好。”

广州市某小学的林老师说：“我抱着一种矛盾心理，既十分盼望又信心不足。作为教育第一线的教师，尤其是主科教师，都希望学生能学得轻松，学得有效果。我是教五年级语文的。我们的教材确实加大了阅读量，增加的课文都注重人文精神，较贴近学生生活，但区单元测试及期末考试要求、内容都没随之改革。就算新课本不再出现的知识，测验、考试也一样照考。所以我们在日常教学中，既要讲授新课本内容，又要渗透旧教材中有关知识，以应付测验及考试。”

广州市某小学的崔老师说：“我教四年级数学，信心不足。因为从上至下观念都没有变，考试的形式也没有变，仍有应试教育的影子。如区里每学期的抽测、算分、排名次，仍是以前的老一套方法，根本体现不出‘人人学有用的数学’。”

2003年5月下旬，我们系第一次承担“新课程”市级中学培训者的培训任务。这年的秋季，广州市所有区都将进入“新课程”。所以，我在组织培训员学习时，特意安排了一段时间让大家

谈谈自己对即将到来的“新课程”的看法。

海珠区教研室教研员阮老师说：“21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用前天的知识去培养今天的学生，使他们成为明天的人才，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现在一些老师听完课改的介绍后，很震动，开始有一些新的做法，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老师一如既往。第一个原因是没有改的压力，课改首先要从校长做起。第二个原因是老师不知如何改。我们不能穿新鞋走老路。我建议，各区能不能合作交流，资源共享？一些好的实验课可以交流。以点带面，跨校跨区，是不是会更好呢？”

邱老师是越秀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他说：“观念和行为哪一个重要？我同意教学观念为先。现在有的只是课堂行为转变，除了热闹还是热闹。有的演示课只是演戏，人文味道很浓，工具性很差。老师站在多媒体前，只是按键盘，只是电工。如何引导学生？发展是不是对传统的反叛？只有继承才有发展。现在特别要注意的是怎样看待质量，怎样看待基础。”

从化是个山区市，七中的黄老师说：“听了大家的发言，深受启发，甚至有点冲动。”他着重谈了自己的一些“困惑”和“困难”：“硬件方面，办学条件落后。软件方面，关系到老师的水平和观念。要使老师认识到改革对自身有好处，对学生有好处。学生的学习兴趣不浓厚，不喜欢学语文。很多新课文很美，如《斑羚飞渡》，但不知如何把这种美感传给学生。希望多组织实验区的老师来从化上实验课。”

课程改革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如何使理想得以实现，关键在教师（是“关键”而不是“责任”）。客观现实摆在我们面前，就是这样一支队伍，将要成为课程改革的主力军，他们要承担非常艰巨的任务。作为培训者，首要的工作是把这支队伍的思想“统一”起来，而且要意识到，理念的转变或先进理念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其次，要深入到第一线，实地指导（“现场”指导、“临床”指导）才能解决实际问题。